

周恩来和邓颖超——文德楼的浪漫往事

1925年8月7日，一艘由天津开往广州的客轮徐徐停泊在广州天字码头。一位年青女子提着手提箱从轮船中独自走出，她在码头焦急地四处张望，却没有如期见到前来接她的人，便独自坐上一辆人力三轮车，怀揣着急切又欢喜的心一路寻访，终于来到了文德东路的一幢楼房门前。这一天，一对分别4年多的年轻恋人在文德楼相聚了，他们就是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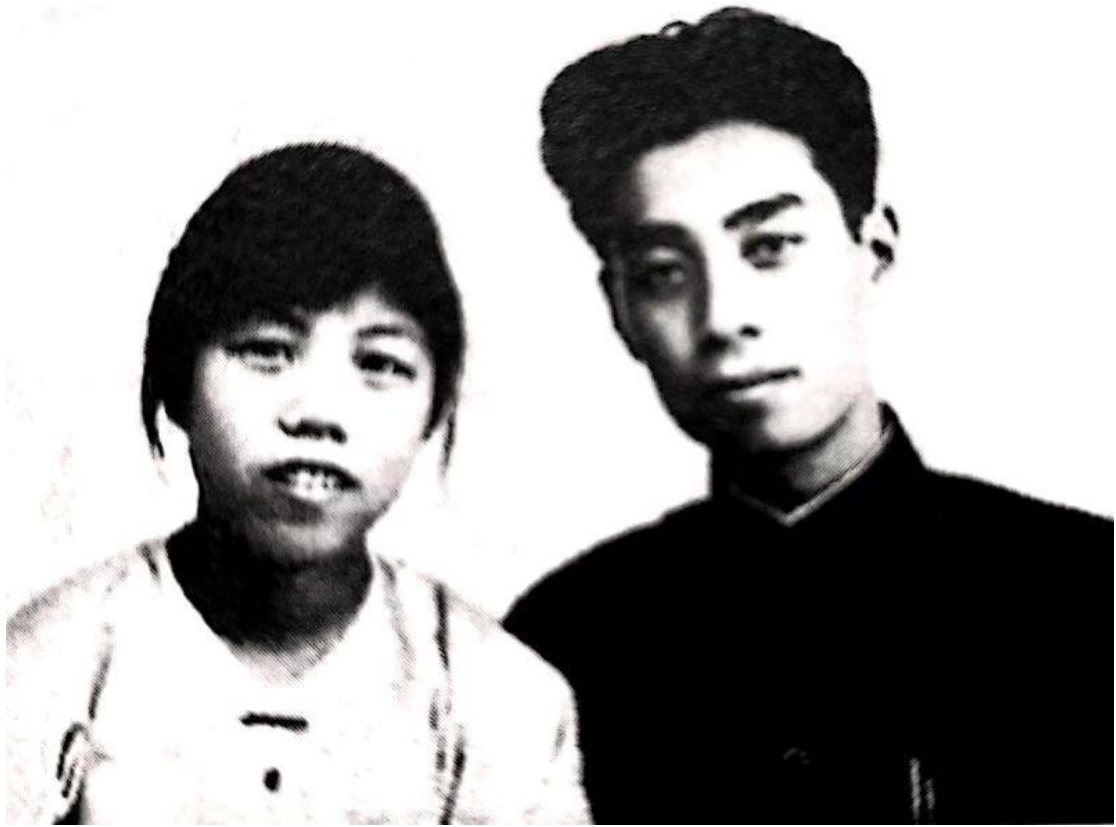
1925年8月8日，周邓二人在北京路太平馆举行了简单的婚宴。他们的新婚居所文德楼，距离位于文明路的广东区委和万福路的广东军委仅几步之遥，地方隐蔽且安静，不少中共领导人都曾居住于此，李富春、蔡畅夫妇住1号2楼，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住4号2楼。那时，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、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，邓颖超南下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。

太平馆的婚礼当日，嘉宾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她和周恩来的恋爱经过，邓颖超说：“怕什么！要我说我就说。我啊，因为个子矮，噙一下就上了凳子，站在板凳上，当时恩来还特别为我担心，怕我应付不了。其实我什么也不怕，当年五四运动我在天津是演讲队队长，这点事我怕什么，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讲，把我和恩来怎么相识、怎么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，大家听了以后连声鼓掌叫好。”张治中听后赞许道：“周夫人，名不虚传！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。”谁知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什么周夫人，我有名字：邓颖超！”那晚，沉醉在幸福中的周恩来喝了许多酒，邓颖超和蔡畅扶他到阳台上吹风，邓颖超用毛巾给丈夫擦脸。

1926年“中山舰事件”后，周恩来和邓颖超移居万福路190号南华银行楼上的广东区委军委处，此处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，外面挂着南华银行的招牌，二楼却秘密进行着中共领导的军事工作。“大厅内摆放着几张办公台、一部手摇电话机”，“还摆着一套西式沙发，几张酸枝椅和茶几是会客室，周恩来、邓颖超经常在此接待客人”，“大厅西面一间狭长的房子是周恩来、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”。邓颖超常坐在那儿打毛线、看报纸，以此来对当时的秘密军事工作进行掩护。

1926年底，周恩来被调往上海工作。1927年，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，周恩来密电广州军委，让邓颖超设法撤离广州。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，大批共产党员遭到追捕，此时刚小产后的邓颖超在西关长寿西路的王德馨产院疗养。当日凌晨，妇女运动骨干陈铁军赶到医院通知邓颖超，在医生、护士的帮助下，邓颖超化装成赴港购药的护士，从沙面白鹅潭坐船抵达香港。

时光飞逝，30年后周恩来再次回到广州。当他路过与邓颖超1925年曾居住过的文德楼时，回忆如潮水般涌来，他致信给当时因病未能随行的妻子：“昨天车过广卫路，发现了广卫楼（文德楼），快30年了，不能不引起回忆……”文德楼，这座斑驳的老房子留下了一段动人的浪漫往事，也镌刻了周邓二人最美丽的感情记忆。



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合影。